

※ 荒木見悟教授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 ※

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悟先生

柴田 篤* 著 金培懿** 譯

一

距荒木見悟先生仙逝，業已兩百餘日¹。我受委託寫些與荒木先生有關的追憶，然關於先生學問方面的業績或是其哲學性世界，乃至先生之人品等等，估計今後也將有許多人會援筆為之撰寫。因此，我想記錄下些許先生與其安身任教最久的，而我自己多少也是如此的，有關先生與九州大學之間的二三事。

二

以下且先回顧荒木先生與九州大學的因緣關係。

1940年（昭和15年）4月	進入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院（文科）就讀
1942年（昭和17年）9月	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院（文科）畢業
1942年（昭和17年）10月	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院副手（副手即教務助理，正職，至1943年2月）
1946年（昭和21年）2月	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院研究所特別研究生（至1949年11月） （1947年10月，九州帝國大學改為九州大學； 1949年4月，法文學院改為文學院）

* 柴田 篤，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。

** 金培懿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。

¹ 編註：這是指作者執筆之時。匆匆又四年逝矣。

1962年（昭和37年）4月	任職九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
1968年（昭和43年）7月	升任九州大學文學院教授（中國哲學史講座）
1969年（昭和44年）4月	擔任九州大學評議員（兼任，至1969年7月）
1971年（昭和46年）4月	擔任九州大學評議員（兼任，至1971年10月）
1971年（昭和46年）11月	擔任九州大學文學院院長（至1972年6月）
1981年（昭和56年）4月	自九州大學屆齡退休
1981年（昭和56年）5月	獲頒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稱號

荒木先生身居九州大學期間，作為大學部學生共兩年六個月；作為教務助理有五個月；作為研究所特別研究生共三年十個月；擔任副教授一職有六年三個月；而擔任教授一職則長達十二年九個月。雖覺先生「長久安身於九大」，然若從先生只差兩個月就迎來人生百年的長遠生涯來看，則先生安身任教於九州大學的時間，也就僅占其約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生。然即便如此，對我而言，先生終究就是「九大的荒木先生」。

三

荒木先生自己在回顧其作為研究者的人生時，屢屢言及其與楠本先生的相遇。而楠本先生正是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講座的首任教授楠本正繼先生(1896-1963)。荒木先生在一九七四年刊行的《朱子·王陽明》（收入《世界之名著》系列叢書）一書的解說中，亦從如下此段引文開始說起。

昭和十五年四月中旬，在某間教室的角落，進入九州大學法文學部就讀的我，在無止盡的不安感不斷襲來的同時，等待著中國哲學史講義課開講。終於，推開教室門走進來的，卻是與我事先所想相反，與所謂的「漢學先生」類型相去甚遠，身穿瀟灑西服的楠本正繼先生。

在九州大學與楠本先生相遇，受楠本先生指導，毋庸置疑的，對於荒木先生作為研究者的人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對於荒木先生學問之形成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。

楠本先生結束逾三十年的教職生涯，從九州大學屆齡退休的兩年後，荒木先生就任九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。該年乃荒木先生畢業後第二十年。翌年十二月底，楠本先生病逝，享年六十七歲。受命處理告別式等喪葬事宜的荒木先生，日後說道：「這真是一項艱辛的任務！截至告別式結束為止，我不得不拼命壓抑住情

感。」（語見後述《大學廣報》）一九六五年三月發行的九州大學文學院同窗會《會報》第八號，設有「懷念楠本先生」專題，其中荒木先生投稿的追悼文〈百萬遍之一夜——追憶楠本正繼先生〉，是一篇看得出荒木先生即使在壓抑中，也充滿了對楠本正繼先生無限敬愛與追慕之思的文章。

四

荒木先生榮升教授的一個月前，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夜晚，九州大學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。就在美軍歸還「板付基地」之前，戰鬥偵察機在九州大學校園內墜機失火。而失事地點就發生在距離文學院研究室僅有數百公尺遠，正在興建的大型計算機中心（日後的九州大學情報基盤中心）工地現場。該起意外事件，點燃了九州大學的學生運動，教職員和學生被捲入其中，進入了所謂的「大學紛爭」時代。筆者相信，即使對於一味專注投身於學問研究之道的荒木先生而言，那也是一個作為「大學人」非常痛苦的時代！爾後，在校園封鎖等混亂狀態稍稍沉靜化時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，荒木先生被選為文學院院長。當時，校園內的混亂狀態雖說暫且獲得收拾，然紛爭火種猶存，校園內的傷痕尚未痊癒。身體違和的先生，翌年住進了九州大學醫院，七月一日卸任文學院院長一職。

而我進入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就讀，正是荒木先生就任文學院院長前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。在僅有一名新入生的研究室，荒木先生針對不辨左右、不明狀況的大學二年級生所開設的中國哲學史演習課，就是朱子的《論語集註》。學生的我於課前準備，課堂上在先生面前讀解原文，接著由先生提示其自身之原文讀法，雖然關於朱子之思想先生亦有稍作說明，但該門演習課基本上就是一味地閱讀《論語集註》原典文獻。然先生並未對筆者的文獻誤讀有過任何叱責。如今想來，在最初那門長達數個月的演習課上，先生試圖確實培養我精確閱讀原典文獻的為學態度，並令我了解其中意義。而在文學院院長這一職務繁重的行政工作中，且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狀態下，對於剛進研究室的新生，荒木先生也就只是沉靜以對。而如今我重新體認到：對我而言，那段歲月真是畢生難忘的珍貴時光！

五

卸下文學院院長一職隔年，荒木先生徵聘北海道大學的佐藤震二先生作為研究室的副教授。五年來一人肩負起中國哲學史講座營運重責的荒木先生，在終於覺得可以鬆一口氣時，孰料隔年佐藤先生旋即驟逝。對於研究室當時的情況，先生寫道：「為了從那沉鬱的日子中重新振作起來，不得不尋求某種心靈支柱。」而先生又說，其結果就是由研究室成員共同編纂而成的《二程遺書索引》（見同書〈卷頭語〉）。繼大熱天裏的這一共同編纂作業之後，我所回想起的，就是荒木先生接續講授原由佐藤先生所開設的「王弼《老子註》」演習課。我們幾個學生每週一次，造訪先生位於福岡市南區皿山の府邸，修習先生的「王弼《老子註》」演習課。有幸聽講過荒木先生的《老子》課的學生，估計除了我們之外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從先生府邸告退後，大家緊張感消除，一邊談笑風生一邊走向巴士站牌的光景，恍如昨日之事。

佐藤先生逝世隔年，荒木先生為研究室招聘進東北大學出身的町田三郎副教授。町田先生是一位與荒木先生不同類型、朝氣蓬勃的新銳研究者；也是一位富有進取氣質，且充滿行動力的運動熱愛者。此時，研究室每年的新進學生數也有所增加（雖說如此，每年也就是一兩人），學生們也受到啟發和刺激，勉學生活愈發精進。而荒木先生的身體也恢復得相當康健，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，先生元氣旺盛地集結研究成果，著書立說之外，進而逐次展開諸如刊行近世日本儒學者之全集、前往調查日本各地所藏漢籍、添購圖書館館藏書籍等學術活動。而先生完成其親自主持的、由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的綜合型研究計畫「明末における思想運動の総合的研究」（明末思想運動之總合性研究）該年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三月，先生從九州大學屆齡退休。

適逢屆齡退休，荒木先生受託撰寫兩篇文章：一篇是九州大學《大學廣報》第三九三號（1981年2月16日發行）特邀稿〈九大を去るに当たって〉（離開九大之際）；另一篇則是刊載於九州大學文學院同窗會《會報》第二十四號（1981年3月31日發行）的〈寒中端坐—九大を去るに当たって—〉（寒中端坐——離開九大之際）。後文記載標示為：「轉載自《大學廣報》」，內容係屬同一文章。該文前半內容言及荒木先生與楠本先生的相遇與分別，文章後半則描述了先生即將退休的心

境。然而這篇讓文學院後輩教員感觸良多的文章，除了九大相關人士和九大文學院畢業生之外，鮮少為人所知。故以下謹轉錄該文後半內容，為拙文〈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悟先生〉作結。

六

如今，回首三十餘年的學究生活，我發現自己的工作存在著重大的缺陷，換個角度而言，那有著自我欺瞞，故而不得不感到顫慄！原本我之所以重回研究所就讀，乃是因為在那化為廢墟的「長崎之丘」上的慟哭，正是我復學無可取代的動機。設若如此，則作為探究東洋思想之一端的學者，我理應更加嚴肅地正面迎戰所謂的生死，或是人間愛等諸多問題。然而，當我仔細地重讀自己的論著後，卻完全無法感受到自己有追索此等東洋思想之根本問題的氣魄。明明縱使漫步在九重群山間，我也仍可聽聞夏空雲層彼方幾萬生靈的哭聲，但卻無法將之反映在我日常的研究本分之中，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確實，在青壯年時期，對於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化作活字面世，我也感到一種天真單純的喜悅，陷於一種炫學式的自我陶醉之中。然而人生至此，需要面對的對象已非「人間」；而是「神佛」！然若自問拙論值不值得供奉於神佛之前，則我實在沒有勇氣抬頭面對神佛。在接近人生最後階段的如今，我陷入了一種不得不判定自己的學究生活，其實不過就是「忘卻根本而執著於枝葉末節」的心境！自以為做了些什麼，然而那些「什麼」，卻猶如放進竹簍中的水一般，不斷地從雙手之間流逝而去。而若說我何以淪落至此的原因之一，是因為我仗著所謂九州大學這樣的龐大研究機構，恃寵而驕所導致，那就真是慚汗三斗，猶仍不足表達我心慚愧。

